

当前心理学文化转向研究中的 方法论困境

霍涌泉¹;李林²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7; 2.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当前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在取得一系列丰富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露出一系列深层次的发展问题。由于无法寻找到一种有效适用的研究心理文化问题的方法工具,其面临的方法论困境异常突出,如怎样正确处理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研究范式达到视界融合,后现代及全球化社会背景下的心理学文化冲突等,急需加以研究和解决。

关键词:心理学;文化转向;范式转变;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2-0049-06

现代心理学是一个理论上缺乏中心然而在方法论上仍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所谓方法论,就是指讨论心理学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科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原则。西方心理学各流派之间的根本分歧也就在于方法论方面。因此,对于文化与心理学的考察及认识首先要抓住它的方法论问题,只有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了,才可以正确地看待各种文化研究模式在心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也才能吸取其优点,摒弃其缺陷。近2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文化转向热潮,不仅反映在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之类的专门分支学科的崛起上,而且在发展心理学、健康心理学、认知科学、人本心理学、建构主义、生态心理学以及进化心理学等基础学科与流派中,也出现了对文化因素日益重视的趋势。心理

学视野中的文化转向研究,目前已基本扫清了文化与心理学研究的外围障碍,使西方主流心理学也不得不承认有关文化范畴问题研究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在这场心理学的文化研究高潮中也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发展性难题与困境。由于无法寻找到一种有效适用的研究心理文化问题的方法工具,因而文化转向的心理学研究在方法论领域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旧的心理学范式并没有停止运行,新的范式面临着难以容忍的模糊”[1](33页)。走过了开创阶段的心理学文化研究如何进一步向纵深领域开掘?文化转向的心理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理论进步,除了要不断积累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之外,特别需要在如何科学地认识文化心理学的理论高度上寻求突破,以便能够提供实践的方法论原则与研究范式。

1. 困境之一:心理学怎样正确处理科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2004-10-18

作者简介:霍涌泉(1963—),男,陕西吴堡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博士生,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基础心理学硕士生导师;

李林(1972—),男,陕西户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教师,心理学硕士。

之间的关系

文化一般是指特定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包括了信念和价值观、社会风俗和社会规范等等,实际上文化又是一个充满了魅力和歧义的概念。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首先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文化是否是科学?文化能否纳入到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坚持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标准解释文化,还是坚持以自然科学的标准理解文化?近年来有的学者主张以大科学观、大心理学观对待文化。有的学者则坚持严格的科学观和科学标准规范心理学的文化研究。这就牵涉到了有关科学与文化二者之间关系的深层认识问题。

在心理学界,有关科学与文化的认识问题长期以来便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坚持近代的科学观点即牛顿奠定的科学范式和标准,文化问题便无法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如果以人文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化,则又可能影响到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和社会形象。面对这一困境,科学心理学的先驱者们采取了不同的研究道路。冯特采取了两种取向:对个体心理坚持以实验的方法进行详细的描述,而对群体心理则以民族学的分析方法研究。铁钦纳等人则坚持更严格的科学标准建设心理学,将心理学作为与物理学、生物学相齐名的三种典型的科学来对待,认为必须在与同等科学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心理学。后来的行为主义者更是将这种科学观点推向了极端,以削足适履的办法将意识、文化等问题排除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以保证心理学的科学性。在西方传统的主流心理学中,对于科学的理解是从研究方法出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限制,而不是从对象的特性出发进行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为追求心理学的普遍适用性,只好排除文化差异来保证心理学研究的普遍适用性。这是20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心理学的流行做法,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心理学摆脱了思辨与神秘主义的历史桎梏,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对心理学的理解过于贫乏化和简单化的弊端,造成了机械论和还原论的盛行。近年来,西方心理学家一直在反思和修正这一科学观,特别是在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这种反思与修正在西方主流心理学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调整和改变,出现了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

科学是指有组织、有系统地探讨事物真象及其规律的知识 and 学问。作为人类文化精华的一部分的科学,经常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演进。不同时期的科学观对于自然、宇宙以及科学自身的理解都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牛顿范式的科学观在很多方面遭到了超越、挑战和质疑。近代科学方法及其评判标准所可能具有的文化内涵在理性层面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前西方心理学在研究方法论层面上讲,正经历着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后实证主义是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科学观、哲学观。物理学中量子论、相对论的问世,从根本上动摇了近代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认识论根基。二战以后,以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思潮,在认识论层面上否证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普遍客观规律性”和“价值中立”信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流行的后实证主义思潮,虽然没有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在方法论的主张上具有相对确定性,但是通过对科学事实和规律、科学因果性、科学理论和结构以及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等方面的说明中,反映出自己的科学主张。后实证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边际型结构的思想倾向,但其所强调的理论相关性、自然主义认识论、历史主义、功能主义、多元主义观点,有助于克服传统科学哲学偏重实证论、忽视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人文精神的倾向,其对于促进近代小科学观向现代大科学系统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世界范围内的科学观变化运动,也带动了心理学的文化革命时代的到来。当前心理学中文化转向研究热潮的兴盛,正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方法论中科学观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心理学中以近代自然科学为范式的小心理学观向以现代科学的大心理学观新范式转变的必然结果。没有这种科学观转变的科学基础作依据,就不可能在一向以生物科学为范式的心理学中掀起文化研究热潮。当然其中也暗含着一种对科学的泛化理解的陷阱。特别是以多元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观,有可能将科学解构得一无所有。同样,目前在大科学系统观、大心理学观指导下的心理学文化研究也可能在促进心理学科学观转变的同时播下负面的种子,甚至是致命的种子。这种负面文化种子可能表现在对于科学的“泛化”理解上。皮特森指出,“文化

是心理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也是误解最深的一个概念”[2](15页)。心理学作为一门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土壤中成长壮大的热门学科,在被引进和移植到其他缺乏西方文化土壤的国家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我们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当文化研究在缺乏实践层面的方法工具的配合时,更会加重这种泛化趋势。例如,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将一切视为“文化”之虞的现象。如果一切均可以行“文化”之名,这样就势必会使心理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着几乎失去意义的威胁,也会损害文化研究的科学合法地位。文化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科学更是文化精华的一部分。但科学与文化并非完全没有量的范畴与质的范畴的区别规定性。康德曾说,任何事物的质的范畴均有实在性、否定性与限制性特征。作为心理学范畴的文化研究离开了“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性”的规定,就不可能体现其“质的范畴”的独立主体及存在价值。在科学观与文化观之间保持一定的理论张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 困境之二:科学文化取向与人文文化取向的难以通约性

心理学文化转向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难题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消除对立、促进沟通和融合,如果是它们真的能够弥合的话?英国学者斯诺认为,在西方的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而分裂的传统:一种是人文文化,另一种是科学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这样的“两种文化”现象,这种对立将始终困扰着心理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对两种文化的统一并不抱乐观态度。

实证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崇尚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重视对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的探讨及有关变量的测量。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由于变量有限,较易控制,因而实验结果的效度也较易判别,科学水准也容易定位。但作为研究人类高级行为活动的心理学,其所要涉及的问题则非常复杂。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低于其它学科,而是由于人类行为活动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心理学研究的多样性和测不准性。心理学研究的文化现象更是十分复杂,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有效地判明各种已知文化变量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是发现新的文化变量及其与已知文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

第一个问题中,虽然对于较易控制的文化变量在人类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已取得了一定外在效度的研究成果,可是多数内在效度方面的问题仍不明确。而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不断扩大研究范围的新难题。文化转向的当代心理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第二个层面。完成这一方面的任务有赖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完善。近20年来,自然科学范式下的文化研究空白得到了一定的填补,其中生物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生物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某些社会因素影响行为的方式和机制。对于跨文化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脑功能的认知实验研究结果,也已经扩展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生物化学以及生理心理学方面的进展[3](455—456页)。但是,心理学中生物学模式的文化研究,由于重视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特征而对文化特殊性的研究明显不足,因此,许多观点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遗传决定论倾向。认知科学中的生态学模式和联结主义虽然已开始关注人的信息加工机制中的文化意义,可由于现代科学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实践操作技术层面上的困难,现阶段仍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文化心理研究成果。因而,文化转向的心理学研究仍需要人文社会文化范式的支撑。

人文范式的心理学文化研究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科学地位形象呢?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德国学者狄尔泰提出了人文科学的概念。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人文科学立足于对“精神客观化”的理解,自然科学则立足于物理现象及其过程的观察。在人文科学中,理解先于说明、多于说明。自然科学把发现规律和类型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自然要素的同质性使这一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而人文科学对一般规律的发现几乎不可能;自然科学对价值判断不感兴趣,而人文科学则从价值的观点选取并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精神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等人展开了论战,以建立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同时代的

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更是尖锐地批判了心理学界的这种“自然化悖论”。胡塞尔指出,由于心理学家们甚至“连实验方法的诸前提是无法凭借实验心理学自身来建立基础的问题”都没有认识到,因而如果勉强要建立这一基础的话,那心理学就只能是陷入悖论的循环[4](203页)。以解释学与现象学为代表的人文研究范式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

与科学范式的文化研究相比,人文范式对文化问题的理解明显地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这主要表现在对文化问题研究的价值论约束、引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来讲,人文范式对心理学的贡献体现在其对科学理论和研究活动的价值、意义之类的规范上。人本主义心理学重视对科学研究引入“意义、价值”坐标问题,显示出了对科学价值的约束迹象。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的主要代表斯威德又提出了著名的“多元客观世界观与主观建构论”,这一观点强调文化心理学首先需要关心的是“人到底如何解释自己的意义世界与意义生活”。当前认知心理学的生态文化观点也提出,文化心理学要研究“近经验概念”而非“远经验概念”。

另外,在文化研究方法的组织和表征层面上,人文范式的心理学研究也可以提供比较精确化的理论知识组织范式。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是正如美国学者伯纳特指出的那样,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了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条理化的结构性是每门科学的中心内容”[5](14页)。因为对形式化的追求一直是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探讨目标与任务之一。亚里士多德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形式因”。培根也认为“形式正是支配和构成那些简单性质的绝对现实规律和规定性”。在近代,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通过理性方法对自然问题所提出的虽然是尝试性的、然而十分重要的推理性解决办法,为后来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薛定谔等实验科学家和物理理论学家的工作开辟了道路。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发现和认识事物的形式,也就是发现和认识事物的规律,因为自然界的普遍形式就是规律。现代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正是由于依赖于这种严密性的结构化知识组

织模式,提升了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水准。心理学中的文化类型学说、生态学、解释学方法,通过结构性、类型性、功能性的分析研究,同样也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地位。人文范式反对心理学中的物理主义倾向,主张把人当作“人”来研究,而不是当成“物”来对待,认为心理学要关心人类的生活,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充分考虑文化历史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这对于抵消科学中心论的机械主义、个体主义和还原论倾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解释学方法和人文心理学也存在着过分夸大需要、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在方法上带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它对心理学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突出的。而要对这两者进行统一、协调、整合,目前还难以寻找到有效的途径。现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文化研究上所长期存在着的这种互为外在的矛盾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看来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要走出泛科学主义的局限,消除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和分歧,在文化范畴上实现二者之间的有限整合,所需要的并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心理学,也就是价值、意义上的心理学。

3. 困境之三:后现代与全球化状况下的心理文化冲突

在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心理学虽然没有冷漠,但是客观地讲,并没有走在全球性文化理论探索的最前沿。目前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大多是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多样性,而且还相关了多元方法论的异质性。当代心理学对世界文化理论的贡献是局部的、补充性质的。而对于跨学科的目标、认识论和方法论所提出的更深刻的挑战,心理学的积极回应还不多见。要改变这一现状,文化转向的心理学方法论研究,就不能回避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性和全球化对心理学的影响日益突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组成部分的后现代心理学属于另一类的后现代思维范式。后现代心理学建立了三个主要的预设:(1)现实文化是动态的,(2)科学知识是被社会所建构的,(3)知识具有社会文化结果[6](803—813页)。后现代主义试图将心理学从以现代科学为中心的神位上走出来,重视文本分析、去自我中心,要求关注日常生活、常识心理、话语、缄默知识,建立多元化的心理学知识型态。以

后现代性解读本土化,日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心理学者回应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一个理论视角与方法工具。当前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趋势及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与多样化的人类行为模式图景。我国港台有学者认为,尽管心理学中盛行着已被西方殖民化的发展格局,但西方心理学就如同一种“西药”,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各国文化疾病的方案[7](285—310页)。然而,这种心理学的全球化趋势能否跨越多元文化心理的差异分界线而达到如同西药那样的“价值共识”?问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文化心理的差异,根本不可能通过分配或者重新分配来实现心理文化公平。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心理学存在着被西化或殖民化的客观事实。本土心理学只能通过不同心理文化系统或层面的相互交流、对话、相互理解而达到相互共享。同时,所谓心理文化的公正,不在于平均化、甚至统一化的过程,而在于交流和理解的过程,在于不同心理文化之间相互对待的主体间态度。在心理文化的层面上,西方心理学技术性的操作的功效极其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与全球化加重了当代心理学文化的分裂。

4. 解决心理学文化转向方法论困境的策略途径

文化转向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种种变化向心理学提出了重大挑战,并带来了许多尖锐的理论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本来就存在,长期以来就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而现在则凸显得更加尖锐了;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困境却又在不断地产生。文化转向的当代心理学研究必须对此做出比较明确的回答。为了确立既有现实而广泛的视野,又有深刻立足基点的学科领域,我们认为现阶段心理学的文化研究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策略途径。

第一,继续坚持心理学文化转向的跨学科整合发展方向。重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理论整合研究是现代各门学科不断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内在学术机制,也是心理学文化转向研究发展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心理学的文化研究要将持续积累的相关知识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必须依赖于全面系统的科学认识视角。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其必然会涉及到众多的研究对象:当代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当代哲学

(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当代心理学和当代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以及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等学科问题。只有从对这种各方面、各层次、多测度的综合性研究和系统性把握出发,文化转向的心理学发展趋向和未来可能形态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心理学文化研究才能有更加明晰和正确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超越传统心理学对于文化的种种误解,实现研究范式与理解方式的转换,克服对于科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应该把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当成特定内容与具体形式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第二,加强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两种范式的紧密结合研究模式。文化范畴的心理学研究要吸收实证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研究方法的长处,充分发挥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对心理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组织功能。在这一领域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将这些不同的方法主张“以什么方式整合在一起”?应该说,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元理论对心理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组织将会发生共同的作用。立足于人类实践、科学和哲学、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进行新的文化学术整合,是目前比较现实可行的重要策略途径,其中实证方法对心理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组织当然会发挥重要作用。克服文化转向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难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将心理学的文化给以方法上与学科上的必要限制。在学科上进行对象性限制,即要从日常生活心理文化、解释性心理文化和规范性心理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将继续吸收科学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重视文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使心理学的方法和程序、理论和体系走向科学化,巩固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越来越高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的标准,量化的和分类的文化测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心理方法学的文化公平性标准已经得到了考虑。近年来美国学者斯塔茨提出“整合的实证主义”观点对于文化转向的心理学方法论研究可以得到不少启示[8](46页)。当然将文化范畴的心理学研究完全限制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也是不现实的。也很有必要吸收后实证主义心理学观点寻求文化转向的整合策略途径。也就是要在运用人文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阐释文化问题时,必须贯注科学的品格和精神,适当

地引进一些行之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以加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分析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又必须对各种方法的局限性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和警惕。

第三,加强更高一级的文化心理学理论综合的“元理论化”研究力度。要解决心理学文化转向方法论困境,我们认为必须充分借鉴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元理论化趋势对于文化研究的知识组织经验。元理论化是研究学科元理论与实体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趋势,文化心理学的元理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理论,其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文化心理学理论,而是进一步建立文化心理学理论的一般出发点,规定着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理论的方向。文化心理学的实体理论则是关于人的文化心理活动特性,以及各种具体行为活动模式、模型、规律的理论。这在方法论属

于更高一级的学术理论整合途径。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元理论整合是指将文化研究事实、理论和思考都综合到一个全面模式中去的理论研究类型,其不仅超越了经验上已经验证的东西,而且还力图完整地概括出心理学文化研究的一般原理。这对于文化转向的方法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文化心理学元理论与实体理论相结合的原则,首先需要对其已有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进行元分析研究,运用元分析技术可以对文化心理学进行定量的统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自身并形成相关的理论,特别需要加强对日常心理文化生活层面、阐释性心理学文化层面与规范性心理学文化层面的学术整合。文化心理学的元理论化研究,在有效地整合现代心理学所持续积累的相关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将发挥其独特的理论组织功能。

参考文献:

- [1] Vijver F.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0, 31(1).
- [2] Pedersen P.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in counseling: Controversies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Canadian Journal of Coynseling*, 2001, 35.
- [3] W. Tryon. *Contributions of connectionism to post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2, (6).
- [4] 卞崇道主编. *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5] Brent S.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SAGE Publications, 1984.
- [6] Gergen.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10).
- [7] 林耀盛. *社会心理学本土化与后现代论述之间*[J]. 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 1997, (8).
- [8] Adler L., Gielen U. *Cross-Cultural Topics in Psychology*.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Methodology Predicament in Cultural Study of Psychology

HUO Yong-quan; LI Lin

(Psych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Educati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y of psychology, the methodological predicament of which boils down to methodological tool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culture, how to reconcile the patterns of science culture and humanity culture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cultural conflicts in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psychology; cultural reorientation; pattern change;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王永政]